

RU ZI WEN JI

孺子文集

(下)

霍彦儒 著

三秦出版社

孺

子

文

集

(下)

霍彦儒 著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三
秦
出
版
社

陈仓文化论

一、陈仓文化正名

本文将远古至元明清之间发生于宝鸡地区的文化现象称为陈仓文化。其理由如下：

1. “陈仓”一名历史久远。宝鸡古称“陈仓”。“陈仓”一名始于春秋初秦文公时（公元前763年）。先为山名；后为城名，再为县名。一直沿用到唐肃宗至德二年（公元757年），共存在了1500多年。还有一种说法，“陈仓”之名始于炎黄时代。《路史》说黄帝“崇炎帝之祀陈”，而《路史注》：陈“疑在陈仓”。《水经·渭水注》亦云：“黄帝都城言在此”。宝鸡历代地方志记载伏羲治陈、神农初都、黄帝都城均指此。如乾隆年间的《重修凤翔府志·卷五·封建》云：“陈，黄帝后，姬姓，今宝鸡故陈仓有陈山，非宛丘之陈”；《重修宝鸡县志，卷一·沿革》云：“其在上古曰陈仓，为庖羲所治……黄帝都焉……姚睦云：‘黄帝都陈仓，非宛丘，故今陇右黄帝遗迹甚多’。”著名历史学家、民族学家何光岳先生亦持此说^①。如果此说不错，那么，“陈仓”之名的时间则至少存在了四五千年以上。唐中期后，虽说“陈仓”更名为“宝鸡”，作为县一级行政名称消失了，但在民间此名称还继续沿用至今。若以后者说法为据，该名称存在的时间正是宝鸡地域文化孕育、繁荣和延伸与发展的时期。

^① 何光岳：《炎黄源流史》，江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2. “陈仓”所指范围与今宝鸡的地域文化范围基本相当。“陈仓”古属雍州的一部分，夏商为“西垂”地域之一部分，而周属于畿内封国地，是秦国初的都城（“汧渭之会”^①）之地。虽说它的行政所辖范围要比今宝鸡所辖范围小，但此处长期作为炎黄都城、周畿内封国，秦国的史内地和以后县治的所在地（今宝鸡市区内），东北距周原不过六七十公里，距秦雍城不足三十公里，再加上此处又是古今向西向南的交通要冲之地，因而，从文化辐射的范围看，“陈仓”所指范围与宝鸡地域文化的范围基本相当，即今宝鸡市所辖地域。因此，我认为，以“陈仓”命名宝鸡地域文化是适当的。

3. “陈仓”一名的影响大，流传广。该名称自古以来不仅在当地妇孺皆知，古有陈山、陈仓峪，今有陈仓村、陈仓乡，而且在全国也有影响。大凡学过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汉刘邦“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历史典故，并成为成语而经常被人引用。尤其是1993年江泽民来宝鸡考察，亲笔题写了“开发古陈仓，建设新宝鸡”。随着题词的宣传，“陈仓”之名更是远播海内外。因此，以“陈仓”命名宝鸡地域文化既顺理成章，又能体现该文化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4. “陈仓文化”一概念易被普通老百姓所理解和接受。近年来，有些学者在研究宝鸡地域历史文化中，分别提出了“姜炎文化”，“周秦文化”、“岐周文化”、“雍秦文化”等概念。但这些概念都有其局限性。从时间上说，只概括了某一个历史阶段的文化。如“姜炎文化”只反映了宝鸡仰韶文化时期姜炎族所创造的文化，“周秦文化”也只反映了宝鸡周秦时期的历史文化；从地域上说，这些概念只能揭示某一狭小范围内所发生的文

① 《宝鸡城市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

化现象，如“岐周文化”仅指周人在今岐山周原一带所创造的文化，“雍秦文化”亦只能指秦人在今凤翔一地所创造的文化。再说，“岐周”、“雍秦”与“宝鸡”也形成不了对应关系。有学者又提出了“宝学”（宝鸡之学）的概念^①。笔者认为，这只是从一门学科（严格地说“学问”）而不是从一种文化的角度提出，且不如“陈仓文化”易为一般人所理解和接受；再说“宝鸡”之称谓的时间也较短。因此，我认为采用“陈仓文化”一名更能反映宝鸡地域历史文化的实际，也便于向外宣传和进行文化交流，提高宝鸡知名度。

二、陈仓文化的发展

分为三个时期

（一）孕育时期

这是指发生于今宝鸡史前的文化现象。据宝鸡文物部门报告，宝鸡域内截止目前已发现确定的人类史前文化遗址超过了700处，其文化类型基本上是居住遗址。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和中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有今眉县营头、麟游史家原两处，出土有刮削器、砍砸器、尖状器等。它说明了4万年前今宝鸡地区已有了人类活动。在今宝鸡市区先民的村落最为密集，约在5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已发现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居住遗址有近20处，属老官台文化遗存，以宝鸡北首岭下层、高家村、斗鸡台等遗址为代表，距今已有7000多年。

继老官台文化之后的仰韶文化遗存的居址有500余处。这是今宝鸡地区发现的数量最多、分布最密集、内涵最丰富的原始文化，其分布于宝鸡的2区10县，集中于宝鸡渭河及支流两岸。其显著特点：一是遗址面积大。据测定，超过1万平方米的占总

^① 文怀沙：《深厚的文化历史土壤》，《新华文摘》，1993年第10期。

数的70%，超过5万平方米的占总数的40%，超过10万平方米的占总数的15%。最大的有贺家湾遗址达80万平方米，宁王遗址75万平方米，其它如全家沟、龙家湾、双碌碡等遗址，都是面积较大、人口众多的村落。据人口研究工作者测算，北首岭氏族村落约有200人口，以此数字类推，那时仅宝鸡市区内就约有2000多人^①，全地区至少在万人以上。二是内涵丰富。出土的器物较多，石器有石斧、石铲、石刀、石磨棒；陶器有钵、碗、盆、瓶、壶、孟等盛食器，还有鼎、罐、瓮、瓶等炊具，陶质陶色与纹饰多样，且有了彩陶；骨器有骨针、骨锥；存留遗址有灰坑、陶窑、房址、墓葬等。丰富的内涵说明当时生产力已有了长足的进步，也说明母系氏族公社制度已走向完备和繁荣。村落分为居住、窑场、墓葬三部分，先民们是共同劳动，共同消费。这一时期的生产方式主要是农耕。这可以从北首岭遗址、福临堡遗址得到说明。北首岭遗址，总面积达6万多平方米，从已发掘了的来看，文化堆积达4米以上，上、中、下三层具有明显的连续性，出土生产工具951件，其中农业生产工具268件，占26.9%；狩猎工具81件，占8.6%；渔猎工具6件，占0.6%；日常生活用具和制陶工具共617件，占64%。另外，还出土了加工谷物的石磨盘、石棒以及谷物、蔬菜遗籽，说明北首岭人已从游牧经济转向农耕经济。福临堡遗址出土生产工具共461件，其中用于农业生产的工具有375件，占81%以上，骨镞、网坠等与渔猎生产有关的工具27件，占5.8%。与北首岭相比，福临堡先民的农业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已过上了以农业为主的

① 梁福义：《宝鸡史话》，陕西旅游出版社1990年版。

定居生活^①。

属于龙山文化类型的遗址有 200 余处。其特点是单个面积大大增加，如娘娘庙、石嘴头、西高乐等遗址均在 10 万平方米以上。宝鸡龙山文化遗址以双庵遗址为典型。它位于岐山县境内的周原，面积为 100 多万平方米，已出土大批遗迹遗物。从这些文化遗存看，此期的农业、家畜饲养业、畜牧业及手工业等都有较程度的发展。特别是适应于一夫一妻家庭生活的房屋以及盛行的单人葬，“充分地表明了人类的婚姻形态已经由原来的对偶婚而转向了一夫一妻制。家庭结构的变化，便产生了继承权的问题，也加速了私有的进程和阶级的分化。在凤翔辛村和石嘴头的墓葬中，随葬品已经有了较大的差别，这种现象与北首岭的时代截然不同。从此可以看到社会财富的集中，人类社会已经迈进了阶级社会的门槛”^②。

夏商时期，在今宝鸡及其周围地区分布着一种姜姓土著文化，即“刘家文化”^③。邹衡先生命名为“姜炎文化”^④。这类文化遗址已发掘的有刘家村、高家村、晁峪、姬家店等处。刘家文化遗存位于陕西扶风县刘家村，以偏洞室墓葬和高领乳状带足分裆鬲为其显著特点。刘家文化的族属，考古学家确定为与周人有

① 分别参见《宝鸡北首岭》（文物出版社 1983 年版）和《宝鸡福临堡》（文物出版社 1993 年版）。

② 任周芳：《宝鸡考古巡礼》，《宝鸡文博》，1991 年创刊号。

③ 尹盛平：《从先周文化看周族的起源》，《西周史研究》，人文杂志丛刊第二辑，1994 年版。

④ 邹衡：《论先周文化》，《夏商周考古论文集》，文物出版社 1980 年版。

婚姻关系的姜姓部落的文化^①，《国语·晋语》云：“炎帝以姜水成……炎帝为姜”。《说文》云：“姜，神农居姜水，以为姓。”《水经·渭水注》曰：“岐水又东迳姜氏城南，为姜水”。再联系有关姜姓族在宝鸡地区起源和活动的传说、地名、水名等，学术界普遍认为：宝鸡是炎帝族之源^②，“中华民族的根与本”^③，由炎帝族创造的以农耕文化为主要内涵的姜炎文化成为炎黄文化即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源头和组成部分。总之，这一时期的文化为周秦时期陈仓文化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二）繁荣时期

经过夏商一千多年的沉寂后，陈仓文化随着周人、秦人相继迁入和定居于宝鸡渭水流域，而迅速走向繁荣；又随着周、秦王朝的建立，而走向全国。

1. 岐周文化。“岐周”即“岐邑”或周原，位于今陕西关中西部的宝鸡，方圆 150 多平方公里。其中心位于扶风、岐山两县的交界处。虽说周人在“岐邑”建国，总共不过百年，但直到周平王东迁，在西周整个王朝中，周王室一直苦心经营岐邑。这里有它的宗庙、墓葬、府库等，仍是周王朝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中心地区之一。所以，可以说从古公到以后的 300 多年里，周人在此创造了辉煌而具有特色的岐周文化。

（1）青铜文化。周原原是周人的发祥地，因而这里的青铜器特别密集，有“青铜器之乡”之称。自公元前 58 年（西汉神

① 邹衡：《论先周文化》，《夏商周考古论文集》，文物出版社 1980 年版。

② 参见拙著《炎帝传》，陕西旅游出版社 1995 年版。

③ 苏叔阳：《读文怀沙先生〈中华根与本〉》，《文汇报》，1995 年 10 月 29 日。

爵四年)这里开始有青铜器出土,两千多年来,从未间断过。例如仅光绪十六年在岐山县任村一次就出土《大克鼎》120余件,1942年在扶风县一次出土鬲鼎等100余件窖藏铜器。解放后,这里还陆续有窖藏发现。仅1976年在扶风法门寺乡的白家村南发现微史家族的窖藏青铜器103件。据此,有学者研究后认为,周原青铜器有四方面特点:其一,成批的发现均出自于窖藏。据不完全统计,近百年来发掘的窖藏达70余处;其二,工艺水平高。多为高、大、奇,凝重厚实,造型精美,纹饰繁缛,体现了好大雄朴之风。如历王鞶簋,重达60公斤,有“簋王”之称。又如举世闻名的毛公鼎、天亡簋、大孟鼎、大克鼎等等,均出土于周原,都是精美的艺术品;其三,多有铭文。岐山董家村出土的37件,其中有铭文的达30件,庄白一号窖藏出土的103件,有铭文的达74件。2003年眉县杨家村出土的西周青铜器27件,件件有铭文,共有4000余字;其四,史料价值高,许多器物的铭文都反映了当时的历史,如何尊提供了周武王伐纣的时间,卫鼎、卫盂铭文提供了西周中、晚期土地关系以及诉讼刑罚等情况;散氏盘铭文记载了散、矢两诸侯国争夺土地的情况^①。逯文记载了西周除幽王以外的11代12王的事迹,证明《史记》对西周历史的记载是可靠的。此外,在今宝鸡市区的茹家庄、竹园沟、纸坊头等,亦出土了一定数量的青铜器。总之,青铜文化是周人对中国文化的一大贡献,至今还让世人赞叹。

(2)“敬德”文化。周人在天命观上,如同殷人一样笃信“我生不肖命在天”^②。但随着殷的灭亡,周人不能不思考,殷是

^① 《宝鸡城市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

^② 《尚书·西伯戡黎》。

天之骄子，却为什么“昊天大降丧于殷”^①，令其“候于周服”^②？于是，周人开始认识到：“受禄于天”的必要前提条件，并不在于祭物的丰厚和礼拜的虔诚，而在于统治者的“宜民宜人”，即配命、多福的神旨获得和人事努力。于是，周人进而提出“德”的概念，作为统治者“宜民宜人”的理论依据。“皇天无亲，唯德是辅”^③，“德”在殷商卜辞中从未出现，可见它是周人独创的思想。其核心内涵是规范、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自身行为。它与“孝”不但反映了国家制度，即所谓‘宗庙社稷之礼’，也表现在社会意识等方面。因此，西周文化换言之乃是以德、孝为核心的礼乐人文文化。”^④“敬德”思想的出现，不仅开启了春秋战国之时大兴的民本思潮之先河，儒家的“德治”、“仁政”之说，实盖滥觞于此。正如孔子所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而且“是中华文化史上里程碑式的事件。它对于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建构，文化形象的塑造，都起到基础和骨架的作用。”^⑤它的主要发明人是周公，也因此而受到后世志士仁人的极度推崇。

(3) 甲骨文。从1976年起，在周人“岐邑”之地，分别发掘了凤雏和召陈两个大型建筑遗址。凤雏村遗址，据碳14测定是周文王时代的建筑。在其底下6米处发现了17000多片的卜甲卜骨。其中290多片有字，共为580多字。记载了祭祀、征战、

① 《尚书·多士》。

② 《诗经·大雅·文王》。

③ 《左传·僖公五年》引《周书》。

④ 张岂之：《从炎黄时代到周秦文化》，《炎帝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⑤ 冯天喻：《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29页。

田猎、政治、外交等方面的内容。有一片母指指甲大小的甲骨上，竟刻了30个字。有的字如小粟米，需借助放大镜才可辨识，这也反映了我国微雕技术是有悠久历史的。周原甲骨文，可以说，是自安阳殷墟甲骨文之后的又一批珍贵的历史财富，这同周王朝的青铜器铭文一样是我们研究西周经济、政治、文化的第一手资料。

(4) 建筑业。西周建筑业的发展水平大大超过了商代。在周原发现的凤雏村和召陈村两处建筑遗址，相距只有数里，却分别代表了西周早、晚期的建筑技术水平。凤雏一号基址是西周早期的宫殿（宗庙）遗存，全部建筑座落在整片夯土台基之上，由三个庭院及其四周的房屋组成封闭式的建筑群。以殿堂为中心，合理地安排了庭、堂、厢、阶、室、塾、门等单体建筑，采取南北中轴的对称布局，井然有序，组成一个大的四合院。墙壁用夯土版筑而成，墙体内设木柱以加固版筑并承受屋顶荷载。墙面和地面用砂、黄土、石灰混合的灰浆涂抹，使表面光洁、平整、坚硬，特别注意的是屋顶已经使用了瓦。《诗经·大雅·绵》：“揅之隤隤，度之薨薨。筑之登登，削屡冯冯。百堵皆兴，鼙鼓弗胜。”这是周人迁居周原后，兴建宫室宗庙热烈场面真实而生动的描写。召陈村的建筑群基址于西周中、晚期。这时的屋顶已全部施瓦。这里出土的瓦不仅数量多，而且种类多，有板瓦、筒瓦，每种都分大中小三种型号，此外，还发现了三种半瓦当。瓦的发明和使用，是我国建筑史上的巨大进步。

(5) 科学文化。①周人创立了二十八宿，以确定天体的位置和日月星辰在天空中的运行。如《周礼》记载的冯相氏掌“二十八星之位”即此。已有齐全的“年、月、月相、干支”四要素。②在天文历法发展的基础上，数学也得到相应发展。《周髀算经》、《考工记》等书记载了西周时的数学成果，如勾股定

理、测量方法等。③在对世界的认识上，一是周人提出了“五行”的观念^①；一是传说因周文王被囚禁而演《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说明周人已开始以一种朴素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解释世界的生成和变化。④西周的史学已成为一门独立学科，有专人负责。《礼记·王藻》：“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主要表现：一是青铜器铭文，通过记述封赐、祭祀、宴享、征伐、俘获、诉讼等方面的历史事实，真实地反映了西周社会史、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诸方面的情况。二是现存的今文《尚书》之中的《周书》，大部分为西周时期的作品，为史官所记录收藏的官府文件，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三是《诗经》，这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既有很高的文学艺术价值，又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据统计，关于岐周篇章大约为140多篇^②。

2. 雍秦文化。这里所说的雍秦文化，主要是指从秦襄公在今宝鸡建国（先都“汧”，后迁“汧渭之会”，后又迁平阳，再迁雍城）到献公迁都栎阳，这段387年（公元前770年—前383年）所发生的文化现象。

主要表现：

（1）农业生产及畜牧业。秦以农立国，农业生产在继承西周农业文明基础上进一步有所发展。大量史料证明，秦地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和使用铁器及牛耕的地区之一。如长武—春秋早期墓出土1件铁匕首；甘肃灵台县景家坪村的春秋墓出土的铜柄铁剑；春秋晚期凤翔秦1号大墓出土有铁铲、铁锛，均系铸

① 《尚书·洪范》。

② 《宝鸡城市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

件^①；陇县边家庄秦人早期墓葬中发现有铜柄铁刃短剑^②。铁农具及牛的使用，促进了秦农业的发展，秦穆公时救济晋国灾荒的“泛舟之役”，就充分表明了秦粮食生产的发达与积贮的富有。在畜牧业方面，秦人以擅长养马著称。春秋战国时，秦人仍然保持着这一传统。当时著名的相马专家伯乐为“秦穆公之臣，”九方皋则为秦人^③。云梦秦简的律令中有不少保护六畜饲养的规定，《日书》中亦有许多涉及六畜饲养的内容。

(2) 手工业。雍秦时期，秦的青铜器制造业，直接继承周人的生产经验和技術，所造铜器多具有西周遗风。在雍城遗址已发现的有春秋时代的秦公钟、秦公罍、秦公簋，凤翔姚家岗宫殿区出土的64件大型建筑铜构件，以及一些墓葬出土的铜礼器等。除铜礼器有的铸造较粗外，其余的铸造技术均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在制陶手工业方面，秦人在立国前已深受周的影响，立国后秦的制陶手工业有所创新和发展。雍城宫殿遗址出土的陶板瓦、筒瓦、瓦当等建筑材料，形制与西周及关东诸国皆不相同，显示了秦文化的独特风采。春秋中晚期秦墓出土的仿铜器彩绘陶，如大耳壶、大口罐等，反映了秦国制陶业技术的进步。此外，秦公1号大墓出土的彩色丝织物及木胎髹漆猪、金鸟、金兽，以及玉器、骨器等，反映了秦国的丝织、漆器、金属细作等各种手工业都发展了起来，且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3) 科学文化。在此方面，秦人的建树也是多有成就。其一，秦的医学水平领先于东方各国。如秦医缓首次提出了“病

① 韩伟、焦南峰：《秦国雍城考古综述》，《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5-6期。

② 任周芳：《宝鸡考古巡礼》，《宝鸡文博》，1991年创刊号。

③ 分见《吕氏春秋·精通》高诱注、《淮南子·道应》。

入膏肓”的医学概念；另一名秦医和，提出了人有阴、阳、风、雨、晦、明六气。这一思想，后来发展为《黄帝内经》中总结出的风、寒、暑、湿、燥、火“六气失和”而致病的著名的中医学理论。其二，以石鼓文为代表的古籀文，为秦人所独创。它自唐代于今宝鸡市区的石鼓山出土后，成为一代代文人墨客、专家学者咏叹、研究的对象。《石鼓文》是我国保存至今最古老的刻石文字，也是秦文化的珍贵见证。其三；《秦风》与《秦誓》是秦文学的代表作。《秦风》是《诗经》中关于秦文学的专章，共10篇，“生动地反映了春秋时期秦国的社会现实，具有很高的艺术性与史料价值。”^①《秦誓》是秦穆公所作的一篇誓词，“全篇语言诚挚，自始至终运用对比手法，写得深刻有力，是春秋时秦国散文的代表作，实开《左传》之先河，在中国散文发展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②其四，屈肢葬、洞室墓葬俗是秦文化的独特标帜。如在雍城（今陕西凤翔）秦墓地发掘10墓，其中7墓为此种葬式^③，除此之外，这时期的秦人在音乐、美术、工艺等方面也有很高的成就。

（4）宗教——時文化。“時”是古代祭祀天地及五帝的固定场所。“時文化”，是秦人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所形成的独特的宗教文化。《史记·封禅书》多次说到“维雍四時，上帝为尊”；又“自古以雍州积高，神明之奥，故立時郊上帝，诸神祠皆聚云”，“雍旁故有吴阳武時，雍南有好時，皆废无祠。”从以上记载看，雍地是秦“時文化”的中心。据考证，从秦襄公到秦灵

① ② 黄留珠：《秦文化概说》，《秦文化论丛》，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③ 参见《1981年凤翔八旗屯秦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5期。

公，共设时六处，除一处在今甘肃礼县，一处在今陕西临潼栌阳外，其他四处均在雍地^①。一是秦文公所建时祭白帝少昊，一是秦宣公所建密时以祭青帝太昊，一是秦灵公所建吴阳上时以祭黄帝，吴阳下时以祭炎帝。这是秦人不同于周人的宗教礼仪形式。它体现了秦人的多神崇拜的宗教思想。

总之，秦文化通过继承故有文化，吸收周文化，创造发展新的文化，三种文化基因互相连属，从而形成“一种新型的具有自身特征的秦文化”^②，即雍秦文化，为秦国后期的繁荣昌盛、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

（三）延伸与发展时期

秦汉以后，随着政治中心的东移，陈仓文化融入中华文化的巨流。“客观地说宝鸡地方文化已无明显的地域个性。”^③但由于东与长安文化毗邻，西与甘青文化连接，南与巴蜀文化相通，这里是中原文化走向西域、巴蜀的通道，再加上从远古到周秦丰厚的文化积淀，汉、晋、唐、宋、元、明、清之际，陈仓文化虽已失去了昔日的辉煌。但在某些方面还继续得以发展甚至居全国前列。

1. 在此曾发生过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丰富了陈仓文化的内涵。其著名的有：楚汉关中之战；汉皇帝如汉文帝、汉景帝、汉武帝、汉元帝、汉成帝等多次于雍郊祀“五时”；诸葛亮“六出祁山”，与魏之战。法门寺因藏释迦牟尼佛指舍利而成为历代皇帝，特别是唐皇帝的皇家御用寺院。北魏和隋文帝末年，曾两

① 刘明科：《雍地——秦人时文化中心论》，《宝鸡社会科学》，1995年第5-6期。

② 袁仲一：《秦文化论丛·从考古资料看秦文化的发掘和主要成就》，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③ 《宝鸡城市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

次开启地宫奉迎佛骨舍利。唐代先后有唐太宗、唐高宗、武则天等七位皇帝开启塔基，六次奉迎佛骨舍利到长安或洛阳，唐肃宗在凤翔平定安史之乱；吴玠、吴璘二兄弟于和尚原（今宝鸡神农乡）抗击金兵；闯王高迎祥三打扶风，闯王李自成大破陇州等。

2. 历朝历代涌现出众多的历史文化名人，为陈仓文化谱写出新的篇章。他们是：继承父志，完成巨著《汉书》，“创立断代新体”的班固、班昭二兄妹（今扶风人），扶风“绛帐传经”，其门生达千人以上的东汉大教育家、经学家马融（今兴平人），为蜀汉之开国英雄的政治家法正（今眉县人），巧织《旋玑图》，经研究可得诗 7958 首的前秦女诗人苏惠（原武功人，后嫁扶风）^①，一生著述颇丰，曾被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称其为“整个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数学注释家”的唐代科学家李淳风（今凤翔人，一说岐山人^②），创立“两税法”的唐代改革家杨炎（今凤翔人，一说宝鸡县人^③），北宋理学创始人之一，“关学”首领，“气化”论的哲学思想创立者张载（出生于长安，后定居今眉县横渠），在凤翔为官三年，创作了 200 余首（篇）诗文的北宋大文学家苏轼，为官清廉、制定《大清律》，人称“党阁老”的党崇雅等等。宝鸡山川毓秀，人才辈出，除以上所述之外，仅见经传者就达六七十人之多^④。

3. 历久不衰的佛、道教文化，为陈仓文化增添奇光异彩。宝鸡从汉代起就设寺建观，道教、佛教开始兴盛起来。其中有名的有：①扶风法门寺。始建于东汉桓灵年间。史书记载：法门寺“因塔而置寺，寺因塔而著名”，它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保存完整

① ② ③ 《宝鸡城市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4 年版。

④ 参见张润堂：《宝鸡名人传》，三秦出版社 1992 年版。

的释迦牟尼佛真身舍利的佛教古刹。法门寺历为皇家寺院，尤其至唐，由于隋唐皇帝的“九启六迎”之盛大佛事，寺院发展为24座院落，占地千亩，僧众千人，香火缭绕。古为“关中塔庙之祖”，今为我国著名的佛教圣地。②宝鸡金台观始建于元末。明初，张三丰居此扩建重修，雄威壮观，当时为关中西部重要的道教活动之地。③陇县龙门洞。碑载：龙门洞“始于春秋，再建于西汉”。它以绝壁之奇洞，凌空之险殿而著称，是西北一座道教名山。元初，著名道士邱处机在此隐居七年，创立了全真教龙门派。

4. 别具一格的民俗和民间文化，体现了陈仓文化的地域特色。习俗方面，如婚嫁、生育、寿诞、丧葬、祭祀、居住、饮食、服饰等，都各自有一套内容和程序，反映了宝鸡人民质朴、勤劳、纯厚、诚实等美德。民间文化主要有：焰火花炮、木版年画、彩绘泥塑、剪纸刺绣、拼布制品、草制漆器、西府社火、马勺脸谱、秦腔曲子等等，无不流溢着陈仓文化那独特的韵律。

三、陈仓文化的特征

(一) 先导性。自新石器时代到西周、春秋战国时期（除过夏商），陈仓文化从全国范围来讲，都是处于先导地位，可以与当时的“齐鲁文化”、“河洛文化”、“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并驾齐驱，甚至在某些方面还领先于它们。在史前时期，这里有关桃园和北首岭下层的老官台文化，有半坡、史家、庙底沟、西王村等类型的仰韶文化，有以双庵遗址为代表的龙山文化，还有刘家文化及其遗存。这些人类原始居住遗址，说明了宝鸡地区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尤其农业经济是相当发达的。西周时期，周人创立的礼乐文化、青铜文化等，在我国文明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特别是礼乐文化，对我国国家制度的形成，传统道德的产生，都发生过深远的影响。秦国时期，秦人又以改革开拓